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马克思归来

上

[瑞典] 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加] 莫斯可 (Vincent Mosco)

传播驿站工作坊

主编
译、校

Marx is Back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马克思归来^①

[瑞典] 福克斯、[加] 莫斯可 主编
传播驿站工作坊 译、校

Marx is Back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归来/(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主编;“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675-4013-2

I. ①马… II. ①福… ②莫… ③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传播学—
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①G20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1643 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Marx is Back

edited by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Copyright ©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719 号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马克思归来

编 者 (瑞典)福克斯 (加)莫斯可

译 校 者 “传播驿站”工作坊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60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013-2/A·005

定 价 138.00 元(全二册)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 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发展的转折点,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方面的危机不断加深。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全世界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都面临挑战。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想象与信念,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消亡,反而在这些新的问题与危机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生机。马克思的“幽灵”在世界各地正以不同的方式复活。

与此相联系,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体系与制度,一方面作为技术基础和经济部门,一方面作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和民主社会的基础,也面临着深刻的转型,而转型中的巨大困惑和危机也越来越多地激发人们的思考。一系列历史与现实中的问题亟需从理论上做出清理与反思。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理论资源的批判传播研究在长期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传播制度朝向更平等、公正的方向转型,并为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与方法,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批判理论的新路,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

由于中国问题和传播问题是讨论全球化危机与出路两个重要领域,中国传播学界具有担当起自己历史责任的义务和条件。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全球视野中整理、理解与反思这一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这一历史传统的更新与发展,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个全球视野不仅面对西方,同时更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开放,并希冀在不同的比较维度与视野中,

重新确立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近一个世纪前,在1929—1930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后的欧洲,在法西斯主义屠杀共产党人、扼杀左派思想的腥风血雨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用大写的“批判”一词代指“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此后,“批判”一词,因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内核,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以追求人类解放和挑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学术取向的代名词。今天,我们不愿也无需遮掩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把本书系定名为“批判传播学”,除了出于文字的简洁性考虑之外,更是为了突出我们的批判立场,强调我们弘扬以挑战不平等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传播学术的主旨。当然,批判的前提与归宿是建设,批判学术本身即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建设性理论实践。在此,我们对传播的定义较为宽泛,包括任何涉及符号使用的人类意义分享实践以及这些实践所依托的传播技术和知识基础。

本书系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道路,重新检讨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前提的观念、范畴与知识谱系,反思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在历史和当代语境下中国化的成就与问题,探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传播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丰富、发展和挑战,分析当下的经济危机与全球媒体、信息与文化产业的状况和相关法规、政策,以及全球、区域与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我们尤其关注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播定位和文化自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社会现状,社会正义与批判的生态学视野下的信息技术与社会发展,文化传播、信息产业与阶级、种族、民族、性别以及城乡分野的互构关系,阶级意识、文化领导权的国际和国内维度,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动态历史关系、文化传播权利与全球正义等议题。我们还将挑战横亘于“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现实”、以及“批判传播”与“应用传播”间的简单二元对立,不但从批判的角度检视与质询那些维系与强化不平等社会关系的传播观念与实践,而且致力于促进与发展那些挑战和变革现有不平等社会传播关系的传播政策、观念与实践,并进而开拓批判视野下的组织传播、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等应用传播领域的研究。最后,我们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方法论发展与经验研究的批判性运用,探讨文化研究如何在当下传播情境中更新其批判活力,关注媒介教育、文化赋权和社区与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大众传媒与网络时代的大学、学术与跨国知识流通如何强化或挑战统治性知识权力关

系等问题。

本书系包括“批判传播学译丛”、“批判传播学文论”和“批判传播实践”三个系列。“译丛”系列译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文论”系列以专著、讲义、论文集、工作坊报告等形式展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研究的前沿;“实践”系列侧重传播实践的译作和中国经验,包括有关中外传播实践和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卓有成就的中外传播实践者有关自己的传播劳动和传播对象的反思性与传记性著作、以及富有批判性的优秀新闻作品。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ECNU-Cornel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和2013年7月成立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是这套书系依托的两家专业机构,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支持。宗旨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和跨文化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推动中国传播学术的创新和批判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尤其是新一代批判传播学人的成长。

在西方,面对信息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马克思回来了”已然成了当下批判传播学界的新发现、新课题和新动力。在中国,在这片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就被一代思想家和革命家所反复思考、探索与实践的古老土地上,我们愿以这套书系为平台,为发展既有世界视野又有中国学术主体性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对过去一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做出深刻反思,需要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与实践前沿建立有机的联系,需要在克服媒介中心主义的努力中与国内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产生良性互动,更需要与各种不同的传播研究学派、观点进行真诚对话,彼此砥砺,以共同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推动以平等与民主为目标的中国社会发展,促进以和平与公正为诉求的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建立。

是所望焉。

“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代序)

——关于《马克思归来》的翻译

赵月枝

本书的翻译出版是一个宏大的工程。虽然每章分别有译者和校对者的署名,但是,本书的“总译者”是“传播驿站”。在我眼里,这是一个比所有署名译者和校对者简单相加更博大的学术共同体,一个通过批判地引介国外“批判传播学”文献来培养中国传播学术自主性理想的承载者,也是一株充满成长的喜悦、痛苦和烦恼的学术新苗。

由于早年留学,我本人很少阅读翻译成中文的传播学术著作,但是,在与国内传播学界的交往中,我逐渐认识到准确翻译的重要性和翻译中的学问。正是这一不断强化的认知,孕育了“传播驿站”的最初胚芽。那是2005年,我第一次应邀在复旦大学“中外传播理论和方法论暑期班”讲学。整整3天,共讲了18个小时,累得我几乎没力气开口。这时当年有位正在翻译一本美国传播学专著的年轻学者,拉着我问一些翻译中的具体问题,包括 good 一词的在某一句子中的译法。我并没有受过翻译的训练,但看了前后文,觉得不应是翻成英语初学者都知道的“好”,而应该是“良”,犹如 good governance 翻成“良治”。这位学者大喜。虽然自己当时真的很累,但看着她那激动的样子,我为自己对别人“有用”而感到满足。这不是因为自己有多高明,而是我从中悟出,一个人在翻译中寻找汉语表达时,需要一双新鲜的眼睛来重新看待那些看起来简单但怎么翻译也不妥贴的字眼。

2006年,还是在复旦大学暑期班讲学期间,我第一次体验到,错翻一个词是多么倒胃口。这年,我在讲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经典文本《“意识形态”的重新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一文,当我发现在

国内某文化研究刊物上已有译文时,喜出望外,这下可以更方便学员们阅读了。可是,当我阅读这篇中译文时,这篇我曾熟读于心的文章却变得非常陌生,甚至十分难懂。当我读到译文中的“贸易联合会”,而我的英文文献记忆中却没有任何霍尔讨论什么“贸易联合会”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译者望文生义,居然把英文中常见的固定名词 trade union,也即代表劳工的组织“工会”翻成了一般是代表商人、资本家的“贸易联合会”了!我进而小题大做地胡思乱想起来:在英语语境里,文化研究最初可是关注工人阶级的学问啊,何以这个简单的涉及劳工的词汇经过学术翻译,到中国就成了有关商人的词汇呢,这是偶然的文字错误,还是整个工人阶级被遗忘的后改革时代中国文化研究及其阶级立场的知识症候?是有人把这个词刻意过滤掉的结果,抑或是学者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知识结构、语言选择或不够认真导致的?在我眼里,此词的错译几乎是对文化研究和霍尔的极大讽刺和颠覆。我对学术翻译的重要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

2008年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范式恢复了可预期生机。在西方传播学术界,面对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危机,许多批判传播学者发现,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通过重读原著来用新的批判武器武装自己,在批判学术道路上重新出发。在此语境下,有了这本致力于信息时代的批判传播研究的 Triple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的特刊——《马克思归来》。我也曾受邀参与为该特刊写文章,但一来忙,二来自己当时指导的一名优秀博士生罗伯特·普雷(Robert Prey)正在潜心阅读马克思,并有理论创新,且有意参与这个项目,所以自己不参与也就释然了。不过,我当时推测,中国批判传播学术的青黄不接和冷战意识形态在中国后改革时代的长期影响将意味着,在中国这个虽然有一批学者因通晓马克思著作和研究马恩列斯新闻传播思想而获博士学位的国度,却可能不会有任何人是这本特刊的作者。

这更加催生了我组织翻译这本特刊的热情,我希望通过集体翻译活动,从一个字、一个词、一篇文章的翻译开始,通过相互协作和翻译工作坊的形式,训练年轻华人学者群体的批判学术意识和对英文文献的分析能力。当时,我正好在筹划成立中国传媒大学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以就把这项工作当作这个研究所最主要的奠基工作。这个想法得到了我的两位学者朋友的鼎力支持:一位是本丛书的主编之一吕新雨教授,一位是在华人传播学界译作颇丰、有非常丰富的学术翻译经验的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

我们一致认为，把这辑特刊当作书系中“译丛”系列的一种，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一方面，中国传播学界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需要知道国外学者是如何重新开始的；另一方面，由于这本特刊的作者并不都是名家，而是有像我的博士生那样初出茅庐的西方作者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学者，这就有利于打破国内学者对外国文献的“经典”性和权威性的既有假定，而以更平等和更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些文献。

于是，“传播驿站”应运而生。当时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即将毕业的博士生龚伟亮以很大的热情投入了初期的工作。我们在“招兵买马”的“启事”中写道，这是一个主要由处在学术起步阶段的博/硕士生和年轻学者组成的翻译团体，旨在批判性引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以及训练青年学人在对原著的译介和批评过程中获得学术思考的视野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厉兵秣马，从而进一步“获得学术萌芽的养料与思想入门的钥匙。”“启事”还充满期望地认为，“传播学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批判传播学的价值支持与重新定向，同时也亟需一批有历史视野、中国立场，同时又有国际眼界的知识青年的薪火相传”。因此，这个从翻译工作入门、围绕一个“译”字的“传播译站”，“愿意成为为年轻学生（学者）提供批判视野的给养、助力他（她）在学术征途中策马扬鞭的学术‘驿站’”。“启事”最后写道，这个学术新生事物“将以蓬勃的朝气和反思的锐气、主体的自觉与智识的品格，以及严谨的学风和友爱的精神树立批判传播学术译介的旗帜与品牌，推动有学术志向的青年学生的成长与进步，促进批判传播学的发声与发展，以具有扎实独立研究能力的青年学者后备军的培养为基础，为中国批判传播学学术影响力与团队学术声势的壮大以及整个传播学学科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正是在这个有高远立意的最初“启事”的涵义上，我们把这本书译者的署名位置给予了“传播驿站”。按照最初的设想，这个“驿站”的协调机构和活动平台依托我们几位所在的院校，采取统一协调（共同遵守一致的时间统筹与技术规范）、分头运作的工作方式，以我们周边“有志于传播学术研究的年轻学子力量为中坚，辐射和带动京沪等地其他高校以及海内外的年轻学生（学者）共同推动批判传播学著作的引介与批评”。我们希望，这一方面可为本书系中的“译丛”系列提供优质稿源，另一方面也为本书系中的“文论”系列以及为以新锐青年学者为骨干的学术工作坊（类似2012年成功举办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工作坊”）培养和输送梯队人才。

“传播驿站”以引介国外大型有影响或有里程碑意义的批判传播学文献

为己任。按照“传、帮、带”的学术承传理念,我们组织有志于批判学术的年轻博士生做翻译者主体,让博士后和青年教师做译校,以单篇文章为单位组织团队进行工作。翻译阶段的工作流程包括组队、选译、试译、初稿、一校、二校等步骤,每篇文章的译校以不同层次学者互助合作的方式协作完成。完成初步译校后,我们组织工作坊,让译者和校对者就翻译中的难点和问题交流意见,寻找解决方法;与此同时,让参与者对所负责的文章结合中国的学术语境进行批判分析,以求共同提高,并在此过程中对国外文献进行甄别和“去魅”,培养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总之,工作坊既是一次译介成果展示,又是一次可以提升翻译水准的集体校阅,更是促进思想的批判性吸收的头脑风暴。

《马克思归来》成了我们“初试牛刀”的实验。项目参与者很多,大家热情也很高。2013年盛夏,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为期两天的“《马克思归来》翻译工作坊”上,海内外年轻华人学子,包括冯建三教授团队中来自英国等地的年轻学者,围绕一篇篇文章的认真讨论场面令人激动,我至今记忆犹新。正是在这个工作坊上,我看到了华语批判传播研究的勃勃生机和未来希望。

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学术工作是辛苦的、繁琐的;翻译工作很难,同时又被认为是“低端”的,甚至是学术“绩效”上不算数的。随着项目进入“深水区”,有人中途而弃了,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而且影响到了这个呱呱坠地的学术共同体的健康成长。然而,也许正是有了“驿站”这个理念所内涵的精神,个别人的“掉链子”并没有拖垮整个集体的集体意志,大家以极大的学术热情 and 高度负责的精神一步一步把工作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积累经验,之后才会少走弯路,做得更好。

我感谢所有参与过本书翻译工作的年轻学者——包括一些参与过这个项目不同阶段和不同性质的工作,但最后并不在译者或校对者署名中出现的学生和学者,包括冯建三教授和邱林川教授。无疑,这本书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是大家精诚协作、团结友爱的结晶。

这里,我有必要提及一些特殊的个体。首先,我要由衷感谢吴畅畅,他不仅一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投入这个项目的上海团队组织工作,而且在这个项目推进最困难的时候,不但默默承担了全部的组织工作,还负责了多篇文章的校对,以及组织了整部书最后的统筹和校对。在“传播驿站”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吴畅畅无疑是贡献最大的一位。其次,我要感谢

张志华，为了推进项目进度，无论翻译、校译还是其他相关的组织工作，他都不计分内分外地全力以赴踏实工作，甚至不惜推迟了对自己非常重要的博士论文的进度。另外，姬德强、高明等也自始至终积极参与本项目的工作，为校对稿子花费了不少心思。特别是项目收尾的关键时刻，张韵、沙垚、范松楠、朱清河、张晓星和陈思博等人对“传播驿站”工作无条件接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我还要特别感谢王满满的认真、大度和宽容——她花费大量时间和心血准备了近两万字的工作坊笔记，这些笔记最终以综述的方式在此书以附文的方式出版，读者因此可以管窥工作坊的一斑。

最后，我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倪为国先生和彭文曼编辑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以及他们的耐心。殷鹏博士为本书的最后统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特此致谢。翻译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作为本书的轮值主编，我愿对本书翻译中的不完善之处负责，欢迎读者帮助纠错和批评。

本书是“传播驿站”这个集体译者的第一部习作。在漫长的3年工作过程中，我们这支团队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我们经历了成长的痛苦，甚至挣扎和失望。但是，我们汲取教训，改进方法，整合团队，重新上阵。2014年盛夏，我们以新的姿态和新的阵容，在复旦大学围绕《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的译介，成功举办了第二期翻译工作坊。我们请来该书的两位编者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在工作坊上与参与者交流，深入讨论本书的背景、编辑理念和主题思想。我们不但在工作坊上热烈讨论了书中的观点立场与中国现实的关系，还请每篇文章的译者或校者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写出作为文章导读的重要内容。本书的注释保持了单篇的统一。

作为“驿站”概念在中外学术交流和批判传播学者代际承传与超越意义上的演绎，在2014年的工作坊上，我们还请来了我的加拿大博士生、《马克思归来》的作者之一罗伯特·普雷(Robert Prey)，分享他在博士论文中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史上知名的“盲点争论”的最新颠覆性挑战观点。普雷这位学术新秀与当年这一争论的关键人物之一格雷厄姆·默多克教授在复旦大学面对面讨论，使一看来是初学者“练兵场”的翻译工作坊成了国际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术的最前沿阵地。现在，普雷的博士论文尚未答辩，就凭着自己的理论创新和优异学术成果成了荷兰知名的格罗宁根大学助理教授了。在与我道别的午餐上，他还念念不忘他的中国之行在他学术成长道路上的重要

意义。

在《马克思归来》付梓之际,《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的译校工作已近尾声,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传播驿站”还会有第三部、第四部译作问世。“驿站”本身就意味着永远再出发。实际上,在国内的一些学术场合,当我听到有人自我介绍说听过我在复旦暑期班的演讲,还有人自我介绍参与过“传播驿站”的工作,当我碰到年轻学者问我是否还继续翻译工作坊时,我知道,“传播驿站”这朵批判传播学中的“奇葩”,已经发挥了她的作用。她不是当下流行语中作为耻笑对象的“奇葩”,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让人惊艳的花朵。在当下充满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浮躁情绪的学术圈里,以她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友爱的性格和脚踏实地的作风,在学术百花园中扎根,有一席之地。诚邀本书的所有读者一起培植她,使她结出更多、更丰硕的好果实。

谨此,是为序。

目 录

“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代序)	(赵月枝) 1
-------------------------------	---------

导论:马克思归来	1
----------------	---

第一篇 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

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	27
理解资本积累:马克思之原始积累理论在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性	65
如何以更少的异化创造更多的剥削?	92
反商品化	116
“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	149
资本的传播:数字媒体与加速逻辑	168
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下的马克思传播理论再思考	196
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	238
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	283
因特网和“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332
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	350

第二篇 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

批判转型中的马克思理论:阿根廷传媒民主化,新自由主义之后	389
------------------------------------	-----

失踪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位置及传播

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位置	418
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	499
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	535
论今日资本主义之“酷”	556
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579
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	611
作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	642

第三篇 马克思与媒介使用

“工人调查表 2.0”: 社交媒介语境下生产性使用研究的民族志方法	665
技术的牧领权力: 反思数字文化中的异化	698

第四篇 马克思, 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

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	717
21 世纪社会主义: 打造国家, 推进革命	754
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	787
马克思回来了! 但是到底是哪个马克思? 知识劳工抑或媒体实践?	814
学术出版的封闭与异化: 学术工作者的训诫	830
资本主义隐私权问题与替代性社交网站 Diaspora	870
马克思的记者生涯: 重温言论自由的辩论	905

附录

对“马克思归来”的再思考——第一期“传播驿站”工作坊综述	931
------------------------------------	-----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①

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②

导论:马克思归来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与当代传播学批判研究

张韵(译),高明(校)

[导读]*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下,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归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内部,具体的概念和理论层面之外,“马克思回来了”之于从事传播学批判研究的学者们而言又意义何在?本文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基础的批判研究方法重要性的强调,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回应。

作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方法,是将人类存在视为物质现实中的历史过程,并通过人类理性去生产关于人类存在的知识的途径。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运用辩证推理去批判地理解文化和意识,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之间的关键节点。而通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于

① 现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信息与媒介系担任媒介与传播学教授。Triple 杂志编辑,著有 *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2008),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2011),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即将出版)等著作。

② 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社会学名誉教授,曾任加拿大传播与社会研究首席研究员(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以及皇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近期著作包括: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with Catherine McKercher,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econd edition(2009), 以及 *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edited with Ursula Huws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10)。

* 本书中,凡“导读”均为译者撰写,凡“摘要”则属原文翻译而来。——编者注

“意识”问题的处理,将推动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同时,当我们满足于对“盲点之争”和“受众商品论”的局限认识之时,作者重新回归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理论资源,将人类活动置于理解社会过程的中心,从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未来的可能性进行探寻的做法,也颇具启发性。

正如本书此刻正在进行的这项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仍依赖于西方理论译介。在西方传播学批判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之间,研究者如果缺少对研究方法的自我意识,或许我们就应该警醒可能出现的“拿来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深入到理论和方法的内在逻辑之中,从中国本土的经验与问题出发,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去探究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以第三世界的经验贡献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学批判研究,媒介批判研究,批判理论。

*“马克思(Karl Marx)又再次流行了”,负责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德国柏林迪茨(Dietz)出版社负责人舒特朗夫(Jorn Schutrumpf)这样表示。自2005年以来,马克思著作的销量在以前低迷的水平上翻了三番,特别是在夏天出现了飙升。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上个月作出了一个恰当的评价:“马克思很早以前就观察到,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通过把现实、权力和能动者归于无生命来使自己神话化。”甚至连教皇也开始赞扬这位资深的无神论者具有“卓越的分析能力”(The Times, Financial crisis gives added capital to Marx's writings. October 20, 2008)。

*现在没有人会声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个老男孩值得颂扬。因为他注意到“这是经济,傻瓜!”,那些看上去无所不知的、占领了经济制高点的伟大人物们当然不愚蠢,他们被剥削的贪婪驱动着,威胁着我们所有人。马克思的作品也不是圣经,尽管他的一些信徒努力把他塑造成这样(The Evening Standard, Was Marx Right All Along? March 30, 2009)。

*马克思回来了。至少德国的出版商们和书店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马克思的书正在飞离货架(The Guardian, Booklovers Turn to Karl Marx as Financial Crisis Bites in Germany. October 15, 2008)。

*如果想要理解接二连三的金融恐慌、抗议浪潮和困扰世界的其他问题,政策制订者们应该好好去研究已故多年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著作。他

我们必须尽早认识到我们正在面临一场百年一遇的资本主义危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装备起来去寻找出路(Bloomberg Business Week, Give Karl Marx a Chance to Save the World Economy. August 28, 2011)。

* 2009年2月2日的时代(Time)杂志以马克思为封面，并且问道：关于现今的金融危机，“马克思会怎么想”？在封面故事里，马克思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救世主，他的思想也因而被肢解地面目全非：“我们需要反思马克思。若想寻求资本主义的解救之道，那就要去研究这个体系最伟大的批评者”(Time Magazine Europe, February 2nd, 2009)。

这些媒体评论无不表明，伴随着新一轮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我们似乎也进入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阶级冲突和危机的不断爆发，马克思的著作才会引起如此热烈的关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bourgeois)报刊企图通过将马克思诠释为资本主义新的救世主来限制和扼制他的理论。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资本主义分析者，同时也是在其所处的时代里对资本主义最强硬的批评者：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程度怎样。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Marx and Engels 1848/2004, 94)

1977年，斯迈思(Smythe 1977)发表了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文章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给予足够重视。35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兴起使学者们不再关注社会阶级与资本主义，相反，人们热衷于谈论全球化(globalization)、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随着共产主义的衰落，甚至断言了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①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成为了

① “历史终结论”最早源于日裔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8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讲座。1989年夏，他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论文《历史的终结》，刊发于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该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译者注